

战后美国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构建 及其当代困局:兼论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

黄 河

内容提要 美国二战后凭借布雷顿森林体系、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以及美元的金融霸权,构建了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步入 21 世纪,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与南方国家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不断深化,美国国内出现了所谓的“铁锈地带”。与此同时,众多南方国家借助吸引外资以及技术扩散的契机快速崛起并试图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欧等发达国家虽在战后早期的制度设计中占据结构性权力优势,如今却因内部产业空心化、财政赤字、社会撕裂等矛盾,难以应对南方新兴市场群体的挑战。南南协定、金砖国家合作与数字经济革命推动南方国家在技术与产业布局上快速追赶及部分赶超,使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面临重塑压力。未来的发展态势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如何有效协调南方国家的诉求,将成为美国制定当代对内、对外的政策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

关键词 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南方国家崛起 结构性权力重塑 美国困局 大变局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250904.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和美元的金融霸权,构建了以“微笑曲线”模式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发达国家掌控高端研发和品牌运营,获取丰厚利润,发展中国家生产则集中于产品组装和原材料供应的低附加值环节。长期以来,该分工模式让美欧等西方核心国家收获显著的经济红利。但随着全球化逐步深入,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出现技术外溢。部分南方经济体通过吸引外资、发展本土研发和完善产业配套,渐近掌握核心技术与品牌运营能力,影响了原有的“中心-边缘”格局。在此背景下,值得思考的是,处于价值链底端的国家如何借助外资与合资企业实现自主研发并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回顾历史,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规则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企业全球扩张筑牢根基,配合以专利等为核心的知识结构,稳固了美国在高端产业的领先地位。然而,南方国家通

过开放市场、适应规则等举措,实现了从产品代工到品牌自主的转型。面对南方国家的崛起,美国产业、技术与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加剧。出于对自身主导地位被削弱的担忧以及受美国国内“去工业化”等问题影响,美国采取关税战和脱钩断链策略,结果却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微笑曲线”的本质是结构性权力的博弈。南方国家技术的逐渐成熟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以及美国能否维系自身主导地位,都有待深入探讨。

战后美国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构建:结构性权力与当代体系矛盾

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深深镌刻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脉络。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来,历经重商主义时代、自由主义经济时代,再到二战后美国借助霸权地位塑造的混合经济时代,世界经济格局逐渐形成鲜明的“中心-边缘”结构。美国凭借在安全、生产等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打造了以“微笑曲线”为特征的全球产业分工模式。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的深刻变迁,这一体系的内在矛盾持续累积。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地缘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让当代世界体系面临结构性危机。^①

(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演进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1500年至1800年的重商主义阶段,西欧通过殖民掠夺和洲际贸易积累资本,构建“中心-边缘”的世界经济结构;1800—1850年以及1914—1945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扩张阶段,工业革命和航运技术革新推动欧美国家的机械生产与对外贸易发展,金本位制和国际金融市场促进资本跨境流动,也引发列强对殖民地的激烈争夺,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自1945年起,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跨国公司构建全球混合经济秩序,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主导的产业分工网络。^②

地理大发现成为西欧国家开启全球扩张的重要契机,自此,一场持续五百余年的全球格局塑造进程拉开帷幕,逐步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经济秩序。通过对殖民地资源和贵金属的疯狂掠夺以及远洋航运技术的显著进步,使西欧迅速确立了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早期核心区域。不可忽视的是,殖民地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依附地位,全球经济在网络化进程中,伴随着严重的不平等和暴力扩张。进入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蓬勃兴起,工业革命为部分欧美国家带来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竞争力,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与产业分工的深度细化。与此同时,列强之间的激烈争霸、殖民帝国主义的扩张竞赛以及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动荡,使得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在20世纪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中积累的强大工业产能和金融实力,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全球货币和金融结算领域的中心地位。借助马歇尔计划、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等多边机制,美国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拓展至更为广阔的范围。这一时期,世界分工

^① 王正毅《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张小明《全球化与国际社会》,王正毅编《反思全球化:理论、历史与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76—92页。

^② I.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35, 160, 161.

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①和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②已难以解释跨国公司主导下复杂的全球分工现象。于是,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相继问世,^③为人们理解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和全球分工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

(二) 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及其内在矛盾

二战结束后,在安全领域,美国通过缔结军事同盟、设立海外军事基地等,为其海外商业利益筑牢安全防线。^④在生产层面,美国跨国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和装配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外围地区,自身则牢牢把控核心技术研发与品牌运营。^⑤在金融层面,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又通过石油美元体制,巩固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话语权。^⑥在知识方面,美国实施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顶尖的科研体系和行业标准制定权,进一步强化了其在高端产业的垄断优势。^⑦

然而,随着跨国公司在外围地区持续开展生产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在跨国合作中,本地工人、供应链伙伴及相关研发主体积累了丰富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南方国家顺势出台系列政策,通过合资经营、技术交流等方式,加速培育自主研发能力。中国的华为、小米等企业,从借鉴海外技术起步,通过自立自强逐步突破关键零部件技术瓶颈,成功打造自有品牌;印度的软件服务行业借助全球IT外包业务,在编程和算法研发领域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外围国家并非注定永远停留在“微笑曲线”的产业链底端。

近年来,美国将国际公共产品“私物化”的行径,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破坏。^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关键国际经济治理组织中,美国长期凭借话语权垄断,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它们纷纷呼吁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进行改革,以便更充分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当下,世界体系正深陷存在诸多深层次矛盾与不稳定因素的泥潭。随着外围国家的产业升级,核心国家在价值链顶端的既得利益遭受强烈冲击,双方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对抗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等发达国家持续减少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动摇了多边秩序的根基。^⑨数字化时代的技术竞争,造成全球技术生态走向割裂。安全考量的不断升温,使得全球产业分工逐渐背离传统的经济效率逻辑,地缘政治风险显著增加。面对南方国家在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的竞争,美国对其核心环节垄断优势被削弱的担忧与日俱增,进而在政治层面强化关税保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03—274页。

②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0—175页。

③ 汪斌、赵张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④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⑤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

⑥ 杨力《试论“石油美元体制”对美国在中东利益中的作用》,《阿拉伯世界》2005年第4期。

⑦ 黄河、刘彦彤《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7期;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131页。

⑧ 黄河、王润琦《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5期。

⑨ 黄河、王润琦《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5期。

护,在安全领域扩大出口管制与科技封锁。特朗普执政时期,这一趋势尤为突出,美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关税战,对芯片、5G 设备设置严苛禁令,并拉拢盟友围堵特定企业,试图阻断南方国家获取高端技术的通道,维持美国企业在“微笑曲线”两端的主导地位。^①然而,美国的这些举措引发了众多国家的反弹与自救。后发国家一方面加大科研投入,扶持本土龙头企业与高校,全力打造自主产业链;另一方面,南方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与资源整合,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从而降低对美国市场与“卡脖子”技术的依赖。

在此背景下,世界体系的周期性危机愈发凸显,若核心国家无法适应外围国家的升级浪潮,不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与多边合作改革,零和对抗将会进一步加剧。南方国家成功的技术学习经验表明,当外资与本土能力实现有效结合时,“中心-边缘”模式是有可能被突破的,这将推动多极化或区域化竞争格局的形成。简言之,当传统霸权难以继续稳固“微笑曲线”两端的优势时,地缘政治博弈将更加激烈,全球产业链可能走向更分散、区域化且多重标准并存的状态。这不仅是美国战后产业分工体系的延续,更是其面临根本性动摇的历史性转折点,预示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将迎来全新的变革阶段,呈现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全球南方国家崛起背景下美国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重塑

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学说为理解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演变提供了全面、系统的视角。南方国家在吸收外资与技术溢出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实力,在安全领域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生产领域成功挑战美国的“微笑曲线”垄断,在金融领域积极探索去美元化与多元货币结算路径,在知识领域努力构建自主专利与标准体系。这些变化共同推动了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重塑,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革。

(一) 安全结构: 地缘政治博弈与南方国家安全自主的兴起

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体系中,安全结构是指一国运用军事、安全和联盟等手段,维护或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②二战后,美国迅速成为全球安全保障的主要提供者。美国通过建立北约这一广泛的军事同盟组织以及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签订双边防卫协定,在全球关键航道与战略要冲部署海军、空军力量,构建起覆盖全球的安全网络。这一安全网络极大地保障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益,确保了国际贸易航线的畅通无阻,巩固了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优势地位。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将欧洲和东亚地区打造成“安全外包”区域。西德、日本、韩国等国家得以将更多的财政资源与人力资源集中投入工业化和高科技发展领域,大幅减少了军备建设方面的投入。这种“安全红利”不仅助力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还使其在经济与政治层面逐渐对美国形成依附关系,间接强化了美国在产业分工中的话语权。

近年来,随着南方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其自主国防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安全网络的依赖度逐渐下降。中国通过持续加强远洋海军建设,并在非洲吉布提设立保障设施,有效保护了

^① 蔡翠红《新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转型变革》,《人民论坛》2024年第4期。

^②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海上航运线路,切实维护了自身的海外利益。印度则在印度洋地区大力扩充海军力量,在与美国开展合作的同时,在部分领域坚持独立自主,积极构建自身的安全保障体系。这些变化使得美国难以像过去单方面主导国际安全框架,其在局部冲突或航道安全问题上的绝对控制力受到明显削弱。

在国际军工供应链与高端技术转移方面,南方国家也在积极寻求突破。它们不再单纯依赖美制武器,而是通过与欧洲国家、俄罗斯等合作开发先进装备,或开展自主研发,成功进入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关键产品市场。土耳其无人机企业 Baykar 研发的 Bayraktar TB2 无人机,在中东市场表现卓越,削弱了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领先地位。

面对南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崛起,美国除维持传统军事存在外,还将“产业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及其拜登政府通过《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 DPA)等法律手段,对供应链和工业分配进行干预,并以“防范中国威胁”“保护关键技术”为借口,强化多国联盟。尽管这一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盟友仍具有影响力,但南方国家通过推动军事多极化与区域安全合作,成功降低了对美国的依赖,在高价值制造与国际贸易谈判中赢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全球经济分工重塑的过程中,安全结构呈现去单极化的趋势。

(二) 生产结构: 外资与技术外溢推动南方国家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

生产结构直接影响着国际产业链的布局与价值分配格局,是斯特兰奇学说中对全球分工影响最为直接的维度。^① 二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与科技实力,引领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环节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外围国家转移,而将高端研发、品牌设计与营销等核心环节保留在本土或盟友国家,形成了典型的“微笑曲线”式产业分工模式。长期以来,这种模式使得美国及西欧国家、日本等国的企业在汽车制造、半导体、化工、电子等高端制造业领域获取了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装配和原料开采等低附加值环节获得微薄收入。

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大量外资涌入南方国家进行生产投资。尽管美国阻止知识和技术扩散的措施发生了策略性变化,企业以防御性对外直接投资来阻止外围竞争者的兴起,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外溢效应仍不可避免。^② 部分南方国家政府在合资项目中实施技术交流政策,或设置本土化率要求,加速了核心技术向本地工业体系的溢出效应。在 21 世纪,中国充分利用庞大的内需市场与丰富的人力资源,加快产业迭代升级步伐。华为、小米、比亚迪等品牌在移动通信、电动汽车等领域与美国企业展开直接竞争,部分关键零部件,如动力电池、光伏组件等,占据了全球过半的市场份额。南方国家在制造和研发端实力的不断提升,显著削弱了美国在生产结构中的垄断性主导地位。苹果公司长期依赖中国富士康等企业进行组装生产。近年来,因美国政府的歧视性关税及政治压力,苹果公司试图在越南、印度等国家建设代工基地。然而,本土供应商如立讯精密等,在为苹果公司提供代工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高端代工技术,并逐步拓展自有产品的研发。

美国出于产业安全与国内政治压力,一方面推动制造业“本土回流”,但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制造配套不足等问题,收效甚微;另一方面,美国提高南方国家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门

^① 黄河《结构性权力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国际公共产品》,《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② 李国学《贸易战的理论逻辑及其应对: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学海》2019年第5期。

槛,通过审查投资并购、严控关键技术转让等手段,试图延长自身在生产结构中的高端垄断地位。但南方国家已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工程师资源,外部封锁反而激发了它们的自主研发意志。“中心-边缘”的生产格局难以为继,南方国家向价值链高端的快速攀升,推动国际产业分工进入更加竞争与多元化的阶段。

(三) 金融结构: 削弱美国通过金融手段对南方国家经济命脉的干预

二战后,美国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随着该体系的解体,美国又构建了石油美元体系,并凭借美联储的全球影响力,使美元成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核心。美国借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世界银行的领导权,主导国际金融结构,调控国际资本流动,实施金融制裁,并对外输出通胀。

近年来,南方经济体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不少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产生了本币国际化的诉求。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积极推进本币结算,印度也与中东、非洲部分地区签订本币交换协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新多边金融机构的成立,为南方国家提供了替代性融资渠道。在商业实践中,沙特与中国在石油贸易中达成部分人民币计价协议,这引发了对石油美元格局松动的讨论。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出现,为去中介化支付提供了新的可能。东南亚一些初创企业利用区块链进行跨境汇款,降低了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和美元的依赖。尽管美国对区块链项目与数字货币平台施加压力,但难以全面封锁。虽然美国在金融结构中仍具有巨大优势,但南方国家的分散与替代策略逐渐成熟,削弱了美国通过金融结构干预南方国家经济命脉的能力。

(四) 知识结构: 努力构建自主专利与标准体系

知识结构主要涵盖专利、技术标准、教育科研体系、信息传播等领域。^① 美国拥有享誉全球的顶尖大学、雄厚的研发资金和完善的专利法保护体系,在冷战后,长期引领全球科技创新议程。美国通过行业标准联盟与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掌握技术扩散的主动权。过去,南方国家研发能力薄弱,大多只能接受美国的技术标准或购买其专利许可。近年来,中国、印度等国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通信标准等领域迅速崛起,专利申请与论文发表数量大幅增加。在5G标准专利池的竞争中,华为、爱立信、诺基亚、高通展开激烈角逐,华为的专利持有数量位居前列,彰显了南方国家的企业在通信领域的专利实力。

为应对南方国家在知识领域的崛起,美国对南方国家核心企业实施知识封锁和专利打压,将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阻止其获取美国芯片设计软件和制造设备。但南方国家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寻找欧洲、日本等替代供应商,在部分领域实现了技术瓶颈的突破。此外,在全球标准组织(如国际电信联盟、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中,南方国家积极争取话语权,在6G标准研究等方面提前布局,试图在下一代通信标准制定中占据先机。如果美国一味强调本国主导地位,拒绝与南方国家协调技术规则,将加剧地缘科技对峙与标准碎片化,这也将抑制美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在知识结构层面,美国的垄断地位已被动摇,多极技术竞争已经成为常态。南方国家通过外资企业技术外溢与本土科研的结合,构建了自主创新生态,推

^①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

动全球分工向更复杂、更均衡的格局演进。

随着南方国家在以上四大结构中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全球产业分工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复杂的态势。美国虽仍在诸多方面占据优势,但难以继续单方面主导全球经济规则。

美国困局的探析

当前,美国面临的困境愈发复杂。在国内,政治极化现象严重,^①“美国优先”政策引发的关税战和制裁措施,不仅加剧了美国内外经济的不确定性,而且削弱了国际盟友对美国的信任,也增加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此外,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屡创新高,使其难以像过去那样大规模投入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对“领导者”角色的支撑意愿也逐渐下降。^②在国际上,南方经济体利用技术外溢和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快速积累工业和知识实力,并借助区域性多边机制开展替代性公共产品供给,使得美国的外部施压手段效果渐微,甚至引发更多经济体的去美国化和抵制美元倾向。

美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理想蓝图”与现实遭遇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美国官员一方面宣扬“美国是世界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却采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这不仅阻碍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而且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和信誉。^③随着南方经济体持续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发展自主创新技术,美国在高端制造和知识产权收益方面的垄断地位将进一步动摇,其“领导者合法性”也面临严峻挑战。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全球秩序碎片化、经济增速放缓,美国国内也出现政治分裂、社会信任下降等问题。下文将通过深入剖析美国国内政困局、外交政策掣肘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竞争,阐述美国在“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所面临的多重挑战及其对全球秩序的影响。

(一) 美国国内政困局与外交政策的多重掣肘

理解美国当前困局,需从其内政层面的深层冲突入手。过去数十年,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加剧,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上分歧严重,选举政治中的“否决政治”和“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导致美国外交政策和经贸战略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④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推行大规模关税政策,对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等多边机构采取退出或不合作态度,并在国会部分势力支持下,实施财政紧缩和收紧移民政策。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美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长期规划和财政支持,其政策的前后矛盾也让国际社会无所适从。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屡创新高,白宫和国会在预算问题上的冲突,随时可能引发“政府关门”或“债务违约危机”,严重损害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⑤财政赤字和国债问题不仅影响美国国内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且也削弱了其海外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① 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

^② 约瑟夫·奈《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全球化智库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第101—105页。

^③ 约瑟夫·奈《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全球化智库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第101—105页。

^④ 吴心伯《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如何重塑对华政策》,《美国研究》2022年第4期。

^⑤ 参见2025年1月8日《华尔街日报》中的《为何手握现金的投资者或会在美国债务上限之争中蒙受损失?》。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优先”政策所蕴含的单边主义和排他性,破坏了与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的信任,阻碍了稳固同盟的形成。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美国要求欧盟和日本在关税和市场准入方面做出让步,同时对钢铝等产品征收关税,并威胁提高汽车关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美国也多次出尔反尔,导致盟友产生不安情绪,促使更多国家寻求摆脱对美国依赖的替代方案。在全球数字贸易和高科技竞争中,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中兴等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推动“技术脱钩”,并要求盟友跟进制裁措施。^①然而,部分盟友出于自身商业利益考虑,对美国的要求犹豫不决或予以拒绝。在关税方面,美国对华高额关税导致消费者承受更高价格,并使许多美国企业,如汽车和农产品出口商等,在华销售业绩下滑。虽然美国本土部分传统产业在短期内得到提振,但进口零部件成本的上升削弱了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在数字服务税问题上,美国强烈反对欧洲部分国家征收数字服务税,^②并威胁实施报复性关税,这使跨国互联网企业陷入两难境地。欧盟对美国数字巨头的行为进行质疑,同时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感到愤慨。在盟友关系上,英国和澳大利亚曾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但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对澳大利亚的铁矿和农产品出口造成冲击,促使澳大利亚重新审视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关系;英国脱欧后,也有意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不再完全追随美国的步伐。

在内政困境、财政压力和盟友信任缺失的多重制约下,美国难以继续充分承担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在南方国家崛起的竞争压力下,美国为维持其主导地位,采取的外交和经济策略引发了激烈的冲突和封锁式博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金融体系和安全合作的碎片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秩序破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 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技术突进与衍生困局

美国当前面临的困境,与南方国家在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随着跨国企业在南方国家广泛设立工厂或开展合资合作,技术外溢效应促使部分南方经济体实现了从“低端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在多个高科技和高附加值领域与美国形成竞争态势。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5G通信、人工智能、高铁和光伏等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在技术标准制定方面也拥有重要话语权。华为、中国中车集团、比亚迪、隆基绿能等龙头企业迅速崛起,成为行业领军者。尽管美国多次对华实施制裁,切断芯片供应,但华为在非洲、中东地区和欧洲部分国家的5G业务仍在持续拓展。近年来,印度通过“印度制造”和生产关联激励(PPLI)政策,吸引全球企业投资,在智能手机组装、制药和疫苗生产等领域发力,形成了部分高端产业集群,在软件和仿制药领域对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构成挑战。

新兴经济体不仅在产业和技术上取得突破,还通过建立区域性或跨区域合作机制,提供替代性公共产品,降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依赖。金砖国家(BRICS)通过新开发银行(NDB)和应急储备安排(CRA),为成员国提供发展金融服务,减少了对IMF贷款和美元结算的依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涵盖东盟及东亚主要经济体,降低了区域内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区域供应链的循环,为亚洲经济体提供了更紧密的技术和产业合作平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整合非洲内部资源,统一关税政策,旨在提升本土制造业能力,增

^① 吴心伯《探索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蔡翠红、李煜华《全球数字治理赤字:表现、成因与中国的应对》,《国际展望》2024年第16期。

强共同市场的吸引力,减少对欧美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在这些合作机制下,南方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了更大范围的生产和市场整合,削弱了美国对国际公共产品如贸易规则、金融救助和技术标准的垄断。由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对多边体系缺乏兴趣,难以应对多个区域协定带来的竞争压力。

(三) 外溢影响:秩序破碎、经济降速与信任危机

随着南方新兴经济体产业与技术的迅猛发展,原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发生显著动摇。^①美国在高科技与供应链领域的全面垄断优势逐渐丧失,与此同时,受国内政治压力的影响,其愈发倾向于采取零和对抗策略。频繁实施的歧视性关税、制裁和封锁措施,严重侵蚀了国际合作的根基,致使多个多边协定陷入僵局甚至停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着关税壁垒、地缘政治干预、数据跨境流动不确定性等诸多风险,这些因素抑制了企业投资与贸易的活力,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愈发显著。更为严峻的是,美国对盟友的施压以及针对对手国的封锁,导致全球各地区面临普遍的“信任赤字”。在安全层面,欧洲诸国尽管依然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但对美国单边退出国际组织、发动关税威胁的行为深感不满。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博弈中艰难求存,多次表达对中美双方的疑虑。印度在参与多边谈判时,对美国的政策也持有保留态度。这种地缘政治的割裂态势,正逐渐蔓延至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谈判等关键领域,严重阻碍了国际经济治理统一规则的形成。斯特兰奇指出,当主导国无力或不愿承担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且外围国家对现行制度不满时,全球将陷入更加破碎的秩序,或者进入多极竞争的混乱局面。^②美国作为曾经的全球主导国,如今正处于这一变革的核心位置。无论其国内政治如何发展,美国都难以重现过去数十年“一超独霸”的局面。

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频繁转向、国内赤字问题的长期悬而未决、选民在对华政策上虽达成共识但执行策略反复无常等现象来看,美国当前的对外行动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这既无法迫使南方经济体屈服,也难以扭转美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更无法挽回其受损的外交信誉。美国在多方制约下进退两难,其面临的困局交织形成系统性风险,为世界经济带来结构性的不确定性。

结 语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构建了以“微笑曲线”为特征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占据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与标准制定环节,获取高额附加值与收益;全球南方国家则长期承担产品装配、原材料生产等低附加值工作,充当劳动力与资源供应方。这一分工模式在过去数十年间,为美国及其他发达经济体创造了巨大利益,有力推动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然而,随着南方国家大规模吸引外资,技术溢出现象日益突出,传统“中心-边缘”模式开始动摇。从中国、印度,到巴西、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众多南方国家借助产业升级和政策扶持,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从最初

^① 黄河、周晓《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特征、挑战与重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 黄河、周晓《世界产业分工秩序:特征、挑战与重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的贴牌代工、基础零部件制造,逐步发展到自主研发与品牌经营。这不仅打破了美国对全球生产结构的垄断控制,还提升了南方国家在产业合作、区域联盟和技术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面对南方国家的崛起,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护策略,一方面推动“制造业回流”,强化关键技术封锁;另一方面发动贸易战,设置关税壁垒,实施跨国金融制裁,试图延缓南方国家在高价值领域的追赶速度。这些举措不仅难以逆转全球产业要素多元化的趋势,而且还加剧了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财政赤字和社会撕裂等深层次矛盾。冷战后构建的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微笑曲线”分工模式所依赖的“高端锁定-低端外包”逻辑逐渐失效。与此同时,南方国家在军事安全、金融结算及专利标准领域的自主能力不断增强,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经历结构性重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回溯历史,二战后美国所确立的产业分工格局,根植于全球货币与贸易机制的重建以及跨国公司大规模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输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马歇尔计划的推行以及美元在能源结算和国际资本流动中的主导地位,让美国在金融和规则制定领域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跨国公司通过与南方国家开展合资与外包业务,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进一步巩固了自身在专利保护、标准制定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垄断地位。从短期来看,这种“各取所需”的分工模式为双方创造了共赢的局面,南方国家通过吸引投资、扩大就业,迎来了初步工业化的契机;美国及其盟友则凭借高附加值的技术研发、品牌打造和标准制定,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工结构难以避免技术的对外传播。从员工技能的提升,到零部件厂商设计能力的进步,再到本土化政策推动下的技术交流,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助力南方国家摆脱了对“微笑曲线”底端的依赖。南方国家逐渐形成挑战美国结构性权力的新动能,并在区域合作和去美元化的浪潮中,构建起替代性公共产品供应机制。

在当前大国博弈愈发激烈的背景下,美国若想继续维系其在全球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内外政策进行深度调整。对美国内部,美国应适度振兴实体经济,着力缓解国内贫富分化问题;对美国外部,美国须以理性、包容的态度看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多极化趋势,通过制度协商和多边合作,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寻求共赢之道。美国倘若继续秉持封闭式竞争和单边霸权思维,挤压南方国家的发展空间,必然会引发更多地区的对抗情绪,导致现有分工体系走向全面碎片化。这不仅会严重破坏全球经济秩序,还将使美国难以持续享受制度红利,最终错失发展的良机。

作者简介: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于文领)

6. Judicial Practice of Civil Procedure Norms: Centered on Trial Time Limits

Zheng Tao • 99 •

The time limit for adjudication is a unique procedural rule in China's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inherent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adversarial litigation model. The practical paradox of the trial time limit system in the post-transformation era of judicial models highlights the lack of procedural autonomy in China's civil litigation procedures. The shift in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rial time limits—from overal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to procedural governance—reflects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China's civil judicial eco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objectives. The rigid temporal management of adjudication has undergone a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by increasingly formalizing procedural rules, creating a façade of legal legitimacy that aligns with the ideals of judicial modernization. Judicial efficiency under the “caseload-judge disparity” still necessitates the role of trial time limits, whether to fulfill judi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or to act as mechanisms for responsibility-shifting and procedural remedies.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trial time limits fully reveals the extern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ivil litigation procedures. The prioritization of procedure over substance, as reinforced by the time limit system, is merely superficial—beneath it lies litigants' persistent demand for substantive justice. Future reforms to the trial time limit system should incorporate flexible adaptations while maintaining overall efficiency guidelines, to achieve balanced improvement in t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7. From Material Disorder to Order Production: The Spatial Rationalization of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Lu Ying, Guo Wenwen • 124 •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communities frequently face problems of spatial disorder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order.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human dimension of this issue, while largely neglecting the role played by material el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pace theory and drawing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relocation communities in Xipo Coun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and impact of materially grounded spatial rationality—under the dominance of modern rationality—on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order in such communit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spatial materiality constitutes another critical force regulating rational order. It exerts significant agency across three phases experienced by relocated farmers—resistance, adaptation, and co-creation—and three phase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construction, assistance, and enrichment. The article argues for reintegrating spatial materiality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lational space theory, which can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s urban-rural spaces under the broader contex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8.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mporary Predicament of the U.S. - Led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Post-World War II: Including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Huang He • 136 •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ed a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that aligned with its own interests, leveraging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financial hegemony of the U.S. dolla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eepening integration of Global South economies into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hains have given rise to the so-called “Rust Belt” in

the U.S. Meanwhile, numerous emerging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South have ascended rapidly, seizing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are now seeking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lthough developed nations such as the U.S. and Europe initially held structural power advantages through postwar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y now face growing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fiscal deficits, and social divisions, mak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Mechanisms such as South-South agreements, BRICS coopera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revolution are propelling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o rapidly catch up in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capacity, thereby intensifying the pressure to restructure the U.S.-led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Moving forward,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ll likely coexist, and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aspirations of the Global South will become a crucial issue for the U.S. in shaping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in its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9.AI-Driven Paradigm Innovation in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Liu Taoxiang* • 146 •

With the breakthrough advances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toward an AI-driven paradigm.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bridging econom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ntegrates numerical computation,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exhibiting pronounced methodological diversity. Its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tages: an early stage characterized by numerical computation of equilibrium theory, a middle stage centered on complex system simulation, and the current stage marked by deep integration with AI. AI technologies—particularly large language models based on deep learning—hav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computational frontier of economic systems, bringing revolutionary innovations to data generation mechanisms, research domains,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This shift fosters an organic synthesis of theory-driven and data-driven paradigms, giving rise to a new mode of “self-generating knowledge”. Although the intersection of AI an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i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it is likely to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iscipline’s orientation and research paradigm.

10.Adaptive Absorption: The Ideational Diffusion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Theory *Hu Peng* • 154 •

The innovation of academic ideas often arises from the interplay of external influences and local tradi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theory, which emerged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community in the 1980s,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ideational diffusion and local adaptation in academic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it reveals that the theory, influenced by modern European state theory, emphasizes the state’s role and critiques society-centered research paradigms. However, shaped by the historical lessons of European stat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the theory avoids advocating statism, instead promoting a balanced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is eclecticism tempers its ideological impact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but enhances its influence in empirical academic research.